

德國大學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實際操作和基礎理論的傳達在大學學習中應該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德國大學缺乏經費，雖然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基本法法規卻形成阻礙。

Winfried Wilke 教授和他符茲堡應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ürzburg-Schweinfurt）的同事們對於大學生的要求不少，「很多學生在學期開始的時候恐怕都在咒罵我，因為在我們學校裏，有很多事情他們一切得自己來。」Wilke 教授笑著說；他和同事們只是盡責地與學生實踐著重實務的教育方式，然而這樣的教學方針在德國的大學內仍屬少數。符茲堡應用科技大學的構想是：每個學生在課堂授課之外需參加三個小組實作計畫，而每個計畫都必須花好幾個月來完成。

在第一學期中，大學新鮮人必須在入門計畫中建造橋樑和彈珠雲霄飛車，並計算這些土木工事的強度。第三學期則開始發展性計畫，Wilke 教授說明：「創意思考是此階段的重點。大學生們透過此學習歷程認識一個產品研發計畫的漫長過程，並且須在計畫的最後用英文提出報告。」

密集輔導的教學構想

然而一些基本知識例如電腦資訊等，則必須由學生自己去學習，一如未來在職場上一般。在第七學期時，學生們應該能完全自行組織模擬式工業計畫，並且必須向提供此案的公司作出成果報告。Wilke 教授補述：「這其實是個艱難的工作，但是最後，大部分學生都會對這些為他們進入職場作所做的準備與累積的實際經驗感到非常振奮。」

然而，大學院校的經費不足，上述的優良學習經驗與成果只有在獲得足夠補助時才能在符茲堡應用科技大學延續下去。因此，Wilke 教授的教學小組非常希望能夠贏取由「德國機械設備製造協會（Vereinigung Deutscher Maschinen- und Anlagenbauer，簡稱VDMA）」主辦的大專院校機械設計獎項「Maschinenhaus（機械之屋）」首獎（獎金 10 萬歐元），然而在 2017 年的競賽中，他們的設計「只」得到第三名而獲得 1 萬 5000 歐元獎金，並在首都柏林親自受獎。雖

然這次大家都有點失望，但是 Wilke 教授表示：「我們仍會繼續努力，並且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其他的補助方案和可行方案途徑。」

家長背景決定學生受教育的機會

從德國的教育系統中能夠輕易看出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性，一個人是否上大學跟他的社會背景以及生活的區域有絕大關係。科學評議會（Wissenschaftsrat）是德國最重要的國家級政治與學術顧問單位，為聯邦和各邦政府教育單位提供內容性和結構性的諮詢顧問。針對 Wilke 教授的案例，科學評議會認為在未來應訂定辦法，讓有抱負和遠見的大學教授能夠長期獲得固定的資助。

淨損失取代教育文化轉型

在科學評議會的最新策略報告中指出：德國應該以更高金額的基本補助資金來協助高等教育界，俾使研究與教學之間有更妥善的結合、教綱和科系能獲得更理想的安排，並且實施一貫性的高等教育教學品質管理。

科學評議會認為這個經費的編列非常必要，即使聯邦和各邦政府已經共同對於將進行至 2020 年的「教學品質協議（Qualitätspakt Lehre）」計畫挹注 20 億歐元經費，以補助提高教學品質的方案，然而在此計畫結束後，高等教育界一樣面臨補助資金的不安定性，而無法保證永續性的教學品質發展。

對「教學品質協議」計畫的效果進行分析研究的學者們業已對此提出批評，認為許多獲得經費的計畫案純粹是帶來無加值效益的「淨損失（英文：Deadweight Loss）」，終究只不過是在青年人口因全國人口分佈變遷而驟降之前，於短期內吸收近年因上大學蔚為風氣而多出來的申請學生人潮罷了。

因此，一個促使大學教學同樣如學術研究般受到重視的真實教育文化轉型，並未發生。為了加強此文化變遷，科學評議會建議設立中央式機構以專事大學教學促進與發展，類似目前的德國學術研究協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簡稱 DFG）。德國教研部（簡稱 BMBF）似乎有意依循前項倡議，在「教學品質協議（Qualitätspakt Lehre）」計畫結束後設立上述機構，以將經費長期留用於教研部內。

許多主管高等教育的政治人物，例如「綠黨及 90 聯盟（Bündnis 90/Grüne）」發言人暨國會議員 Kai Gehring 即支持此構想，他認為：「大學院校必須能儘快有清楚確定的前提條件以進行規劃」才行。

聯邦教研部依法禁止越界補助各邦管轄的大學

德國社民黨（SPD）國會「教育與學術研究委員會」發言人 Ernst-Dieter Rossmann 指出：「一個中央式、致力促進大學教學發展，類似德國教師聯合會的機構，勢必能刺激德國大學教學品質的提昇，並因而對教綱的標準和科系建置帶來關鍵性影響。」

作為「德國科學促進者協會（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秘書長的 Andreas Schlüter 先生曾經推動過無數與大學教學相關的計畫案，他認為科學評議會的上述建議深具指導性，並呼籲：「聯邦與各邦政府應妥善利用基本法第 91b 條文規定中所允許的空間」，且對於科學評議會的建議案「進行設計規劃以於近期予以落實，以促進大學教學領域的前瞻創新文化」。

第 91b 條文規定：聯邦與各邦政府之間在教育領域上嚴格禁止合作關係，在聯邦制的德國，教育始終是各邦政府的主權範圍，這也限制了聯邦政府舉資協助孱弱大學的可能，即使教研部有足夠的預算也無法運用，然而目前這個禁令正在鬆動當中，並且將開創新的契機。

然而對此改變，德國大學校長會議（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簡稱 HRK）抱著不同的看法，認為設立中央式教師聯合會並非正確的解決之道，HRK 主席 Horst Hippler 指出：「不論是現在或是 2020 年之後，我們都不需要任何新設機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規劃清楚且可靠穩固、來自聯邦政府和各邦政府的大學經費來源。…一個長期不斷的競賽式教學補助方案實在是個令人匪夷所思的作法。」他並且批評：「現在，在大學院校已長期無法獲得足夠師資的情況下，廣泛地為制度化管理的專案補助方案作宣傳，實在堪稱學術政策上的錯誤信號。」。

大學教師需要更多的支持與鼓勵

Anke Hanft 女士是統籌前述「教學品質協議」計畫案之成果評估研究的學者，她對聯邦教研部上述政策與 Hippler 主席有類似的看

法：「我對於設立一個類似德國學術研究協會（DFG）的中央式大學教學發展機構的意義感到懷疑。這裏面隱藏著一個危機，因為原來屬於大學內部的教學構想與綱要之發展責任，將被轉移到一個外部的受補助機構上。而事實上教學文化的轉變必須在高等教育的基地 - 大學 - 裏開始。」

優異的教師不能從上而下地予以規定，最重要的還是各大學必須自力建立品質管理的新結構、不斷持續發展，和實踐最現代化的新教綱。Hanft 女士也主張：「為達到此目的，我們必需儘快地为大專院校提供更好的基礎條件。」

此外，科學評議會認為：大學教師們若在上課義務時數以外合理地花費額外時間輔導學生學習，也應該對教師支付合理酬勞，才能導正教學方向而能帶來教學品質的健全發展。Hanft 女士也表示：潛心發展設計、試驗、管理新式教學構想的大學教師們，必須能夠卸下其他任務而專心工作。

上面這些構想與建議不啻為許多盡心為教學和學生們投入的大學教師們帶來些許安慰，只是，直到聯邦與各邦政府針對科學評議會的建議真正地達到共識而落實執行以前，勢必還需憑藉如大學機械設計獎等方案來鞏固與獎勵優良教學成果的意義。

資料來源：2017 年 5 月 12 日，德國世界日報（Die Welt）網頁新聞
<https://www.welt.de/wirtschaft/karriere/bildung/article164491913/Woran-die-deutschen-Universitaeten-kranken.html>